

名词动用的认知分析

凌倩

(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能力和人类的认知能力、大脑思维活动密切相关,语言的使用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大脑认知机制作用的结果。名词动用是人们为适应交际产生的一种语言创新现象,其本质也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转喻机制和隐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切入点对名词动用现象进行研究。

关键词:名词动用;转喻;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所谓名词动用,即是把名词用作动词,执行动词的功能。名词在转类成动词的过程中,意味着名词进入一种构式,名词本身的指称意义消失,而转换为陈述意义。汉语中,名词动用被视作一种修辞格,名词转用为动词能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比如言简意赅、生动幽默、形象生动等;在英语中,名词动用则被认为是构词法的一种,是通过零位派生实现的特殊的构词手段,用以弥补英语名词多动词寡的语言现象。

2. 名词动用认知研究

Dirven (1999)、何星(2006)、王薇(2008)、赵巍,王冬梅(2012)等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名词动用的认知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人类怎样把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通过名词动用表达出来。Goatly, 徐盛桓, 刘正光, 刘国辉等主要从范畴语义关系进行研究。Jespersen(1942)指出名词动用中,动词表示同名词有关的动作或状态;刘正光(2000),李望辉等(2003)指出动词动态的陈述义是通过名词失去指称义的方式获得的;Quirk(1985)认为对于词义众多的名词,其转化后的动词的词义只与该名词某一项的词义相关;朱文俊(1994)认为引申和比喻是动词词义扩展的两种主要的途径;Goatly(1997)认为名词转用为动词的过程本质上是词义的隐喻转变;徐盛桓(2001)提出了“名动互含”的观点;刘国辉(2004)认为名词用的过程实现了从名词的三维空间义、静态义向动词的一维时间义、动态义的转变;王红霞(2012)对名词动用现象也作了认知研究。概括而言,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名词和动词分属两种不同语义范畴的基础上。通过对名词和动词两者间语义关系的分析,解释动词的词义如何从名词的词义引申、转变得来,为进一步探讨名词动用背后的认知机制奠定基础。

Dirven, 王冬梅, 何星等主要对名词动用的认知机制进行讨论。Dirven(1999)认为名词转用为动词的过程是事件图式转喻。刘正光(2000, 2007)认为名词动用是隐喻思维作用的反映,隐喻和转喻是名词动用背后的主要认知机制。在不同事物之间寻找相似性是隐喻识解的前提条件,人们把抽象的名词概念用具体的、形象的动词义表达;转喻识解使得名词和动词的功能发生转移。王冬梅(2001)认为名词动用基于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机制的协同作用,

其本质是用部分代整体的概念转喻。何星(2006)指出在名词动用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名词动用的隐喻用法通过某一特质的域激活以及隐喻来源域的转喻扩展得以实现。

3. 名词动用的认知机制

名词动用的产生有偶然的因素。但是,在这看似偶然因素的背后,还有其它多种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如语言、心理、文化、认知、修辞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名词动用现象得以产生。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大脑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所有这些因素中,认知因素是最为本质的因素。其中转喻识解是名词动用的基本认知机制,同时也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但是,名词转用为动词的过程中,通常来说是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机制共同作用的。

3.1 转喻是名词动用的基本认知机制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来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于人类自身体验所形成的认知模式对语言的表征有着直接且广泛的影响。兰盖克的认知参照点认为,某些具体凸显的事物可作为其他相关事物的认知参照点,如某一范畴中的原型即可作为其范畴成员的认知参照点,是人类认知该范畴的一个明显的表征。兰盖克将认知参照点用于对转喻的解释中。认知参照点普遍存在。将新鲜事物与易感知的事物建立思维上的联系是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就本质上来说,转喻是认知参照点现象的一种。兰盖克认为转喻之所以普遍的原因乃是由于认知参照点能力是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具有有效且便于交际的功能。

在 Dirven (1999)的观点看来,名词动用的认知运作机制是一种事件图式转喻。交际双方确定一个共同的参照点,然后以此为媒介映射到需指示的参照物上,发生转喻。名词动用句中,动词的凸显性高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成为转喻焦点。概念上来说,整个事件图式转喻发生在这个动词内。事件图式转喻可以分为三种:存在图式转喻(the *essive schema*)、行为图式转喻(the *action schema*)和地点/位移图式转喻(the *motion schema*)。不同类型的转喻有不同的转喻焦点。工具、受事、方式等名词通常成为行为图式转喻(the *action schema*)的转喻焦点,被转用为动词。如:

(1) He is watering the flowers.

(2) Let's go fishing.

(3) Please queue up the files.

第一个例子中 *watering* 为做事的工具,被用作动词,成为句子的转喻焦点;第二个例子中 *fish* 为受事,为句子的转喻焦点;第三个例子中 *queue* 指方式,受事是 *file*。

来源、受事、路径、目标等通常成为地点/位移图式转喻(the *motion schema*)的转喻焦点,如:

(4) Jane, could you please powder the aspirin?

(5) The shells were stranded on the beach.

例(4)中 powder 为动作的目标, 例(5)中 strand 为动作的路径, 均为句子的转喻焦点。

存在图式转喻(the essive schema)中的转喻焦点通常由受事、行为图式与赋予受事的某特征等产生, 如:

(6) My mother had nursed the sick boy all the years.

(7) She still nurses the pain of rejection.

(8) My supervisor has nursed a number of new talents.

以上由 nurse 作动词的三个例子中, nurse 的意思分别为“照顾”、“怀着”和“培养”, 具体意义随其后的受事和概念图式的其他内容等的变化而变化。

3.2 隐喻

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1980 年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两位教授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标志着隐喻理论的诞生。1993 年 Lakoff 在其论文《当代隐喻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该理论的内容, 即隐喻的实质是从具体的概念域向抽象的概念域的进行映射。基于隐喻理论, 下文将列举一些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相关的名词动用现象的例子, 主要分析名词动用形成过程中隐喻认知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 并分析其具体表现。看如下的例子:

(9) 到学校了电话我。

上述例子中名词“电话”被用作动词, 意思是“打电话”。这种句子通常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 多为年轻一代人使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的膨胀, 语言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广泛。每天人们都在创造新的词汇。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词汇有了新的用法, 表现突出的是在媒体用语当中, 如广告、报纸、杂志等用语。现代汉语中相似的例子有:

(11) 今天你微博了吗?

(12)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4. 转喻和隐喻在名词动用中的互动表现

转喻与隐喻在名词动用中的互动表现为四种类型。分别为: 隐喻内的转喻, 转喻内的隐喻, 来自转喻的隐喻和纯转喻。接下来, 我们一一探讨这四种情况。

4.1 隐喻内的转喻

此类名词动用的特点是名词转用为动词的过程中发生隐喻映射, 但其中源域和目标域的某个共有成分同时发生转喻映射, 因此称为隐喻内的转喻, 如:

(13) 虽然受了委屈, 但至少从这次的事件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 以此阿 Q 一下。

将自己比作阿 Q, 突出“自我安慰”这一行为上的相似性, 表达“像阿 Q 一样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一下”之意。

(14) 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供全世界人民饕餮的盛宴。

《山海经》曾介绍饕餮具有羊的身体, 眼睛长在腋下, 又有虎齿和人爪, 是十分贪吃的

怪兽;由于它见到什么吃什么,最后吃的太多而被撑死。饕餮常常用来形容贪得无厌,而“饕餮大餐”一词是中性词,目前是形容量大的、十分丰富或十分丰盛的意思。例中把全世界人民比作“饕餮”,在隐喻内包含域突出的转喻内容,“指像饕餮一样大吃特吃”。

4.2 转喻内的隐喻

此类名词动用的特点是在转喻映射的基础上其中的隐喻映射才更易于理解分析,如:

(15)不要羡慕别人的幸福生活,自己好好努力吧,要不红眼也白搭。

(16)现在,作家的脑子里又意识流了一下。(《吕叔湘文集》)

这些例子里的名源动词在转喻关联的基础上,改变了词汇的口常信用领域。“红眼”和“意识流”皆为名词。说话者将这些词原本的使用边界模糊掉,把它们用到不太常用的领域中去,意义也发生变化。这是一种隐喻的延伸,虽然隐喻映射明显可见,但是对它们的理解需要以对转喻关联的理解为基础。

4.3 来自转喻的隐喻

根据 Goossens (1990) 的观点,来自转喻的隐喻又可称为再发生转喻。此类名词动用的情况较少,其特点是源域和目标域能自然地共存于同个复杂认知域。同一个表达式中既有转喻映射,又有隐喻的内容,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归为转喻映射还是隐喻映射,如:

(17)不要再傻瓜下去了,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傻瓜”通常理解为“像傻瓜一样思维、做事情”,存在隐喻映射。它具有转喻基础,用“傻瓜”转指头脑混沌不清而无忧无虑的行为倾向。

4.4 纯转喻

(18)昨晚我读了鲁迅。

这句话中的鲁迅原本为一个作家名字,这里被用来指这个作家所写的书,表达“昨晚我读了鲁迅写的书”之意。鲁迅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作品,因此人们通常用鲁迅这个人名来指代他的作品。转喻不单单是用一实体来指代另一相关实体,而是两个实体相结合生成新的更复杂的意义。

5. 结论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汉英名词动用的认知机制。名词转用为动词的过程中,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机制都发挥着作用。转喻是名词动用的基本认知机制,名词动用的理解离不开转喻识解。名词动用是事件图式转喻,名词用作动词时,转喻和隐喻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笔者以 Goossens(1990)的转隐喻理论为基础对汉英名词动用的实例进行分析,发现名词的词义可以由转喻继续发生隐喻扩展,并且经过隐喻识解运作产生的名源动词词义能够再次发生转喻加工;名词的词义发生转喻扩展之后,也可以发生二次转喻,生成动词词义。所以,对于一个动词而言,转喻和隐喻的相互作用可以反复交叉进行。这种反复交叉的相互作用很可能普遍存在于语言认知当中,并能推动语言的更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Adams, V.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London: Longman, 1973.
- [2] Chafe. W. L.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3] Dirven, R. & H. Clark.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 [J]. Language, Case Grammar Cope with Conversion [Z]. 1986(17).
- [4] Jespersen, O.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I: Morphology [M]. Gopenhagan: Mundsgaard, 1942.
- [6]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7]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8] 何星. A Study of Denominal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9] 刘正光. 隐喻的认知研究——理论与实践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10] 刘正光. 名词动用过程中的隐喻思维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5).
- [11] 王薇. 名词动用的认知修辞研究 [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12] 王冬梅.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 [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1.
- [13] 徐盛桓. 论英语名一动词的转化 [J]. 山东外语教学, 1981 (1).
- [14] 赵巍, 王冬梅. “名词动用”过程中的转喻思维研究 [J].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2 (3).
- [15] 周领顺. 英汉名一动转类词对比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5).

A Cognitive Study of Denominal Verbs

Ling Qi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compet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gnition and conceptual work of human brains.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n use is a kind of conceptual work, which results from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mechanism. Denominal verbs are created when people need to adapt their language into actual communication. It is an innovation phenomena and a cognitive phenomena in nature as well. As a consequence, it is the result of metonymy and metaphor. To account for this phenomena, this paper expl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words: Denominal Verbs; Metonymy; Metaphor